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新开拓
——简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陈　锋

一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清代(以及明清)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取得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就笔者的藏书所及就有傅衣凌、杨国桢主编的论文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洪焕椿、罗仑主编的论文集《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论文集《清代边疆开发研究》(1990),叶显恩主编的论文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研究》(1988),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1990),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1991),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92),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1993),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1993),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993),吴量恺、吴琦等《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1995),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1995),宋亚平《湖北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1995),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996),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1996)等。仅此不全面的列举,已十分可观。但是,尚未见到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从总体上加以系统研究的论著。从这一点上说,陈桦同志的专著《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便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仍是一种新的研究开拓。

陈著《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作为颇具影响的"清史研究丛书"之一,1996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近 30 万字,分作 10 章。为了清楚陈著的研究建构,不妨将章目列出:第一章,不平衡发展的清代社会经济;第二章,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东北经济区;第三章,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耕作区——华北经济区;第四章,人口稠密、商品经济发达的华中经济区;第五章,具有沿海特色的经济繁荣区——华南经济区;第六章,以牧业为主的蒙古经济区;第七章,不断开发中的西北经济区;第八章,相对落后的多民族地区——西南经济区;第九章,长期处于封闭隔绝状态的青藏经济区;第十章,清代自然经济区的基本特征。观此建构,特色明显。除中间 8 章是分区的具体研究外,第一章具有引论色彩,主要论述清代社会经济在不同发展时段、不同自然条件、不同经济作物与经济门类的一般状况以及清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些特点。第十章则具有归结性质,试图通过对人口数量、人口密度、耕地数量、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城镇密度、民族分布等要素的量化分析,申论清代的社会经济格局,并进一步揭示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经济政策等与地区经济发展或迟滞的内在关联。这种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称道,也不难看出作者驾驭这一论题的学术功力。

二

研究区域社会经济问题，对经济区的划分，是研究的初阶和立论的基点。著名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G.W.Skinner)曾将区域体系理论引入中国史研究，他从“大规模经济区域”着眼，将清代的中国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和云贵 9 个区域。台湾“中央研究院”进行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则分作 10 个区域进行。杨国桢先生在 1987 年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广州)上提交的论文《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构架的探索》认为：“区域研究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都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不同学科特定对象的区域，其划分的标准不同，范围也不一致。如地理学上的自然地理区域、经济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区域，气候学上的气候区域，农学上的作物种植区域，经济学上的经济区域、市场区域，政治学上的行政区域，民族学上的民族区域，语言学上的语言或方言区域，人口学上的人口区域，文化教育学上的文化区域，宗教学上的宗教区域，民俗学上的民俗区域，等等，其覆盖、组合的范围大不相同。在同一学科内，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区域的范围也随之而调整”。至于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则要考虑到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政治环境等综合因素。因此，杨先生主张，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文载上引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 1992 年版)。在同一次会议上，叶显恩、陈春生提交的论文《论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则认为，社会经济史区域性研究中“区域”的划分，应该采取多元的标准，既可以行政区域为界，也可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不同的标准来确定(同上)。上述识见，都值得注意和借鉴。陈桦的研究，在前此基点上又深入了一步。他认为，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经济区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按照部门经济进行划分，譬如农业经济区、牧业经济区、渔业经济区、手工业经济区等，在某一个部门经济区内，尚可作进一步的区划。另一种方法是按照生产水平和经济的富裕程度进行划分，可以将不同的地区划分为经济发达区、经济落后区、经济贫困区、经济富裕区。另外，还可以按民族经济区、流域经济区等进行划分。陈著在比较甄别后，采取的社会经济区域划分方法是“综合经济区”划分法，以生产力水平、产业部门种类、地区间经济联系、自然环境条件、民族状况及社会习俗、历史传承、政治因素等七项要素为标准。按照这种标准，很自然地将清朝寰宇划分为八个社会经济区：东北经济区，包括盛京地区、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华北经济区，包括直隶和山西的长城以南地区，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河以北地区，河南、陕西的全部；华中经济区，包括江苏、安徽的淮河以南地区，以及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除外)、江西、湖北、湖南；华南经济区，包括广东、福建以及广西的东部、浙江南部的部分地区；蒙古经济区，包括内、外蒙古地区(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除外)以及直隶、山西的长城以北地区；西北经济区，包括新疆及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西南经济区，包括云南、贵州两省及四川东部和广西西部地区；青藏经济区，包括西藏、青海及四川的西部地区。不难看出，这种划分十分细致，颇具匠心，足可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一种模式。尤其是将蒙古经济区和青藏经济区单独划出，更具特色性的区域经济典型意义。

综合经济区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经济有机体，类似或者等同于自然经济区，强调全区经济功能的整体性。综合经济区的合理划分，有助于对经济区内的自然经济条件、部门经济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区域内的地区间社会经济联系、

经济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进行综合研究。

三

对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识见,当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陈著毕竟是一项对清代区域社会经济进行具体研究的最新成果。就其具体的研究而言,笔者觉得其特点在于下述数端:

一是注意经济区的历史发展演变。对东北经济区、华中经济区等都有概要的上溯论述,指出,“尽管千余年来,东北民族的流动和变化很大,但是‘肃慎’人的后代却始终在那里定居和繁衍。而每一个入主这一地区的外来民族,也不知不觉地与当地土著相融合……他们世世代代被局限在这样一个空间内,从事生产,延续后代,相互往来,形成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民族氛围,奠定了东北经济区的基础”(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第39页。以下只注页码)。“长江中、下游地区历史上的发展成就,为该地区经济在清代处于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自唐代以后,由于战争、移民、民族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华夏民族的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大批人口将其原有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迁居地,在那里定居生活,劳作繁衍,并使当地经济很快地发展起来”(99页)。上溯论述往往被断代经济史著作所忽略,如果功力不及,也很难把握。同时,对经济区内清代的经济发展,也有时段的划分。

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对经济区进行再划分。如把东北经济区区划为辽沈、吉黑、西部三个经济小区,把华中经济区区划为以两湖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区和以江浙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区,把华南经济区区划为福建、台湾、海南、广东等小区,等等。不同的经济小区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其同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内又具有彼此的联系和互补性。作者在分析了华中东部江浙区和华中西部两湖区的经济差异后指出:“华中经济区东部与西部之间的这种较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们不同的地域分工,因而潜存着极大的经济互补性,而长江又横贯其间,将两地连接起来。便利的交通和经济的差异性、互补性,使得东部与西部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并最终使整个区域形成为一个经济整体”(143页)。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论是大的经济区域之间还是小的经济区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小区的再划分,正有利于对诸多特点的论述和细致分析。

三是将经济区域之间进行横向比较。这是与上述经济小区的再介绍及其对各自特点的分析比较相一致的,只不过上述限定在经济区域之内,这里的比较则具有全局把握的宏观性。通过经济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陈桦认为:“清代的社会生产,在不同的地区,具有鲜明的特征。在蒙古地区,大漠与草原造就了游牧业的经济模式,这里的劳动者,世代进行游牧生产,居无定址。在西部的藏族区域,3000米以上的海拔高度以及高寒气候,形成了以高寒牧业为主、辅之以农业种植的混合型经济。在西南地区,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湍急汹险的水道,致使该地平原少,山地多,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农业耕作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而在黄河流域,由于大河灌溉的便利条件以及悠久的文明开发历史,形成了华北平原传统的农业旱作区……”(22—23页)。以此为基点,又具体比较了人口密度、耕作技术、亩产量、商品经济、城镇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异同。

四是对经济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特征有较好的把握。如对东北经济区中有关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以及流民的涌入,具有军事特色的驿站交通和城镇建设;华北经济区中有关北京地区经济

圈的形成及其功能，大运河对华北社会经济的影响，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家庭手工业；华中经济区中有关河工水利以及以海塘、垸田为特色的农田水利，湖广农业分布、发展与粮食流通，长江下游城镇经济、商业性农业与市镇网络；华南经济区中有关台湾、海南岛移民与开发，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多级市场与国内外商品贸易，以福建、广东为中心的多样化经济发展；蒙古经济区中有关封禁政策的禁弛，游牧业的发展以及与内地的商品交换；西北经济区中有关屯田与经济开发，水利的兴修与果物的种植；西南经济区中有关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移民与社会经济的恢复，以矿业、井盐业为中心的手工业，交边地区的山地开发，等等，都颇具特色。

四

就清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言，作者曾对大的经济区如长江中下游地区与黄河流域的华北地区，以及江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作过比较；在一个综合经济区内，也注意到了经济发展的差异与相互比较。但是，尚有就这一思路进一步拓展的余地，如比较重要的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比较、平原与山区的比较、沿海与内地经济的比较、腹地与边区经济的比较等。

对有些经济区的研究似显得较为单薄，如青藏经济区着墨较少，不像其他经济区那样浓笔重彩，这或许受到资料的限制，但再深入发掘，亦尚有可为。

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和今人的基础上进行，如前所揭，对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还是相当可观的。翻检陈著的注释，觉得对有关研究成果的引证、借鉴较少。凡此，留下了一点缺憾。

以上，是我在拜读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之后的一些感观，仅供作者与读者参考。若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作者陈锋：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邮编 430072）